

陕西农村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 及政策建议

张乃侠 赵 莉 韩晓宇

【摘要】根据陕西省17个村庄的农地流转情况的调查资料,采取随机抽样法和问卷调查法,利用Logistic模型对陕西农村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农户的个体因素是影响农地流转的主要因素,而一般认为的工资性收入和政策因素对其影响并不显著,由此应调整促进农地流转的长短期政策。文中的“农地流转”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不涉及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

【关键词】农地流转 影响因素 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2)04-0028-05

引言

早在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就明确“鼓励农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社员在承包期内,因无力耕种或转营他业而要求不包或少包农地的,可以将农地交给集体统一安排,也可以经集体同意,由社员自找对象协商转包”。转包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2009年中央在“一号文件”中提出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并明确指出必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尊重农民的土地流转主体地位,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流转,也不能妨碍自主流转。2010年中央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农村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户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农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在鼓励农地流转。政府鼓励农地流转的政策意义主要在于

试图通过农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改变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状态,挖掘农地生产潜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同时,使农地逐步恢复商品属性,其使用权可以有偿转让而成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使农民在农地流转过程中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和使用权的收益,以增加农户收入。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是一个必然趋势,加快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对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工业化、城市化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从目前我国农地流转情况看,其政策效果并不明显。这里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社会、经济与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前者主要是因为几千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我国农民历来都将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对其产生了强烈的依赖,这只能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来逐步予以化解。本文主要根据对陕西省17个村庄农户农地流转的调查资料,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分析影响陕西省农户进行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要因素,从而为政府决策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一、调查方法与样本结构

1. 调查方法

本研究的调查资料来自于2011年8月“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农地流转下农户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专题调研。此次研究选取了陕西省17个村庄作为调查研究对象，主要采用了随机抽样法、问卷调查法对陕西省农户农地流转的现状做了为期半年的调查。

2. 样本结构

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56份，收回有效问卷256份，被调查的256名农户中家庭平均人口为4.43人，人均拥有耕地1.65亩；被调查者小学文化程度及以下51人，初中文化程度114人，高中文化程度69人，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22人；平均年龄43.32岁。

二、陕西农村农地流转的现状与特点

1. 农地流转规模小，并以流出为主

调研表明，只有30.1%的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有69.9%的农户没有进行农地流转。在进行农地流转的农户中，流出的农户占流转总农户的41.6%，流入的农户占流转总农户的27.3%，既有流入也有流出的农户占流转总农户的31.1%。

2. 农地流转范围狭小，多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主

调查结果显示，农地流出到本村本组的占流出总农户的32.1%，农地流入到本村的占流入总农户的100%，可见农地流转多在本村村民之间进行。而在本村进行的农地流转中，又绝大多数发生在亲戚和朋友之间。

3. 农地流转方式以转包和代耕为主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转包、出租、互换、转让、代耕、入股等方式。本次调查几乎涉及到了上述所有农地流转方式。根据统计调查结果，进行转包的农户占流转总农户的75.5%，其次为代耕和出租，共占流转总农户的17.6%。可以发现在样本地区，农地流转形式主要以转包、代耕和出租为主，这三种流转方式大多限

于集体经济内，市场化程度比较低。

4. 农地流转市场不够规范

在农地流转过程中，66.2%的流转双方采用口头的合同方式，而采用书面合同方式的为33.8%。在所有的合同方式中，68.8%的合同能随时中断，这表明农地的流转还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农民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三、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主要因素分析

在256份农户调查问卷中，转入农地的农户有45户，其中有22户选择增加收入为转入农地的原因，占48.9%；有14户选择种植粮食作物为转入农地的原因，占31.1%。转出农地的农户有56户，认为自己耕种的农地收益太低的有25户，占44.6%；认为缺乏劳动力的有25户，占37.5%。没有发生农地流转的共有179户，这些农户不愿意转出农地的原因是认为自己除了务农没有其他活可干，其次是担心转出农地的收益得不到保障；而不愿意转入农地的农户主要是因为缺乏更多的劳动力及耕种农地的效益太低，增加农地面积对收入增长的影响不大。由此可见，收益是影响农户流转农地意愿的重要因素。

另外，调查显示，有26.2%的农户认为《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户承包农地年限为30年对农地流转没有影响，29.7%的农户认为其对农地流转有促进作用，仅有15.6%的农户认为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年限阻碍了农地流转。调查还显示有43.4%的农户认为农业税减免与粮食直补政策对农地流转有促进作用，11.3%的农户认为农业税减免与粮食直补政策对农地流转有阻碍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农户承包土地权合同的签订和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发放以及政府对农民相关优惠政策对农地流转也有重要的影响。

1. 模型的选择

通过整理调查结果可以发现影响农户流转土地的因素主要有三类因素，即个体因素、制度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为此，可以将农户农地流转发生与否作为因变量Y，取值为0或1，为离散型变量，其中Y=0代表无流转，Y=1代表有流

转; X_i 作为自变量, 代表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 主要包括个体因素、制度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然后, 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

设定农地流转影响因素为以下函数形式: 农户农地流转发生与否 $Y=f(X_1, X_2, X_3) +$ 随机扰动项。 X_1 代表个体因素变量, 主要指农户的年龄和

教育程度、承包土地面积的大小等。 X_2 代表制度因素变量, 包括农地承包经营权年限、农业税减免与粮食直补政策以及社会保障完善程度(主要指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X_3 代表社会经济因素变量, 包括农户的四大收入(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其他收入)。

表1 解释变量的说明

变量类别	变量	变量解释	变量类型
个体因素	年龄	户主年龄	连续变量 (scale)
	教育程度	1—小学及以下; 2—初中; 3—高中、中专、技校; 4—大专及以上	有序分类变量 (ordinal)
	承包土地面积的大小	家庭承包农地亩数 (亩)	连续变量 (scale)
	家庭总人口数	家庭总人口 (人)	连续变量 (scale)
	专门从事农业的劳力数	家庭专门从事农业的劳力数 (个)	连续变量 (scale)
	务工经商的劳力数	家庭从事务工经商的劳力数 (个)	连续变量 (scale)
制度因素	农地承包经营权年限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1—阻碍; 2—说不清楚; 3—没有影响; 4—促进	有序分类变量 (ordinal)
	农业税减免与粮食直补政策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1—阻碍; 2—说不清楚; 3—没有影响; 4—促进	有序分类变量 (ordinal)
	社会保障完善程度	0—较差; 1—一般; 2—较好	有序分类变量 (ordinal)
社会经济因素	经营性收入	农户家庭人均经营性收入 (元)	连续变量 (scale)
	工资性收入	农户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 (元)	连续变量 (scale)
	财产性收入	农户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 (元)	连续变量 (scale)
	其他收入	农户家庭人均其他收入 (元)	连续变量 (scale)

表2 模型参数分析结果

	B	S. E.	Wald	df	Sig.	Exp (B)	95.0% C. I. for EXP (B)	
							Lower	Upper
年龄	.332	.165	4.031	1	.045	1.393	1.008	1.926
教育程度	.378	.188	4.064	1	.044	1.460	1.011	2.108
承包土地面积的大小	.057	.023	6.244	1	.012	1.059	1.012	1.107
家庭总人口数	-.006	.132	.002	1	.962	.994	.767	1.288
专门从事农业的劳力数	.058	.178	.106	1	.745	1.060	.748	1.502
务工经商的劳力数	.476	.221	4.630	1	.031	1.610	1.043	2.485
工资性收入	.000	.000	.486	1	.486	1.000	1.000	1.000
经营性收入	.000	.000	.031	1	.860	1.000	1.000	1.000
财产性收入	.001	.000	10.604	1	.001	1.001	1.000	1.001
其他收入	.000	.000	.355	1	.551	1.000	1.000	1.000
承包土地经营权年限规定的影响	.109	.244	.199	1	.656	1.115	.691	1.799
农业税减免与粮食直补的影响	-.487	.259	3.532	1	.060	.615	.370	1.021
社会保障	.090	.293	.094	1	.759	1.094	.616	1.944
Constant	-3.314	1.314	6.365	1	.012	.036		

2. 模型结果及得出的结论

Logistic 回归分析采用 SPSS16.0 进行，回归方法均为直接输出分析结果。表 2 显示了模型分析的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三大因素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方向、影响程度及显著水平有所不同，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从表中可以看出农户是否进行农地流转与农户的年龄、教育程度等个体因素显著相关，其中农户的年龄、教育程度、务工经商的劳力数达到了 5% 显著水平，承包土地面积的大小达到了 2% 的显著水平。这说明个体因素是农户是否进行土地流转的决定性因素。

一般来说，年长的农户受教育年限短、文化程度较低、思想观念保守，他们对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和厚重感情，并且从事农业活动的经验丰富，善于经营农地。他们强烈的土地价值意识使得一方面既不会让农地抛荒，另一方面也不会轻易转出农地。而年轻的农户由于受教育年限长、文化程度较高、法律意识较强，他们的思想更为开放，掌握农业与非农业技术和有关信息的能力较强，一方面他们无论是在获取非农就业的机会还是在非农就业收入水平方面均具有优势，从而其劳动力机会成本高，因此更有可能将农地转出；另一方面，受教育水平较高或者拥有比较高的农业技术或经营经验的农户，由于接受新知识、应用新技术能力较强，因而他们在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发展现代农业方面更具优势，这部分农户流入农地的愿望较强。

此外对于拥有小块农地的农户来说，流转农地产生的收益比较低，因此农户流转农地的意愿不强，相反对于拥有大块农地的农户来说，流转农地后进行大规模经营的收益较高，所以农户更愿意进行农地流转。另外从务工经商的劳力数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来看，农户外出打工和经商的人越多，非农收入也越会随之提高，相对的从事农业经营的人数就会减少，农户就会选择将农地流转出去。

第二，从农民的收入构成来看，尽管财产性收入达到了 1% 显著水平，但是影响程度却很

低，原因在于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同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相比占总收入的比例较小。而对于经营性收入来说，由于农户大多都是小块分户经营，土地面积狭小，农地流转与否对其收益没有多大影响，因此这个因子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也不显著。此外以往大多数学者认为工资性收入对农地流转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从表中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发现工资性收入这个因子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农户流转农地的意愿与工资性收入的高低无关。因为尽管农户工资性收入较高，但在目前的户籍制度下绝大多数农民在农业领域以外的就业机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工资来源并不稳定，其生活来源、就业及养老、教育依然不能得到保障，所以工资性收入的高低对农地是否流转影响作用不大。

第三，政府对农地承包年限的规定和相关支持政策及社会保障完善程度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也不显著。前者是因为大部分农户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法规的了解不够透彻所致，而相关财政支持政策和保障制度的建设对农民和农业来说，并不能改变其目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仍属于弱势群体和弱质产业的现状，这些只能算是对农业和农民的输血，并不能提高其自身的免疫能力和造血功能。从长远来看，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必须依靠农业自身的积累及农业产业化和技术进步，相关财政支持政策和保障制度只应发挥辅助作用。因此，农地还将继续担负着为绝大多数农户提供基本生活来源、就业及养老的保障功能，农户对农地的依赖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同时，现行的财政支持政策（包括各种补贴）的受益者是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方，而转入土地的一方也就是农地实际耕种者是无法获得国家补贴的。因此，这些因素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显著。

四、促进农地流转的长短期政策建议

上面的结论告诉我们，现阶段陕西农地流

转的主力军是年轻一代的农民，而主要的影响因素则是农户的个体因素，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已经拥有的农地面积大小。农业的产业特性决定了只有当农户拥有一定量农地之后，再增加农地流入才会有报酬递增的规模经济利益。也就是说，农地流转的起步阶段比较困难，但是当其流转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会产生良性循环，从而走上良性发展之路。从短期看，主要应该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以保障流转双方的权益。从长期看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继续深化农村市场化改革，以培育和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农户的个体因素是影响土地流转的决定性因素，这也是农村市场化改革使农民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的结果；同时，农民主体意识的增强又会反过来促进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将有利于农地更合理、更规范地流转。同时，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文件一直强调农民是土地流转的主体，必须让农民自愿地选择，任何人不能强迫或者阻止。在这里，地方政府主要是充当监管者和服务者的角色。

2. 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缩小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更加公平合理地配置教育资

源。前面的分析结果说明，年长农户和年轻农户因为受教育水平的差异而使他们的农地流转的观念和意愿有较大的不同。因此，要加快陕西省农地流转的速度和广度，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高农地使用效率。必须要在根本上转变农户“土地就是命根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而转变的根本途径就是通过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来提高农户的素质和科技文化水平，提升农户非农就业能力的同时宣传土地流转的相关知识和规模化经营的好处。

3. 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民与城镇居民权益的均等化。加快建设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针对农民工制定的限制性就业政策，以保障农地流出的农民拥有和城市居民均等的就业机会。

基金项目：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10YJC840009）

本文作者：张乃侠是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赵莉是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韩晓宇是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王姣娜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Land Transfer in Shanxi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Zhang Naixia Zhao Li Han Xiaoyu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data of rural land transfer from 17 villages, through the random sampling method an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and by analyz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land transfer in Shanxi through Logistic model,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farmers themselves a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while the salary income and policy factors are not as significant as usually thought. Long-term and short-term policy aiming to promote rural land transfer should be adjusted. Also, “rural land transfer” in this paper means the transfer of contractual management rights of rural land, while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nd for construction is not involved in.

Key words: rural land transfer; influencing factors; Logistic model